



19-20世纪 东北文学的历史变迁

主编 李春燕

吉林人民出版社
JILINRENMINCHUBANSHE



19—20世纪 东北文学的历史变迁

主 编：李春燕

著者（按章节排序）

第一编：王 卓

第二编：刘国平

第三编：李春燕

第四编：何青志

第五编：朱立春

第六编：杨春风

第七编：廖 一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20 世纪东北文学的历史变迁

主 编:李春燕

责任编辑:郭春燕

封面设计:曹录新

版式设计:郭春燕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政编码:130021)

电 话:0431-5649710

印 刷:长春市东新印刷厂

开 本:960mm×650mm 1/16

印 张:22 字 数:300 千字

标准书号:ISBN 7-206-04018-7/I·316

版 次:200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 000 册

定 价:2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本书为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
“十五”规划项目研究成果**

目 录

1	第一编	古代向近代过渡时期东北文学的渐进历程
4	第一章	稳中蕴变的嘉庆时代
19	第二章	渐变无声的道光前期
32	第三章	走向近现代时东北古代文学的遗响与新变
38	第二编	东北近代的诗歌创作及其历史启示
40	第一章	传统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展开
67	第二章	对“吉林三杰”的历史文化批评
89	第三章	东北近代文学的历史启示
101	第三编	跌宕前行的东北现代文学
103	第一章	在求索变革中突进的东北新文学
116	第二章	隔绝母体后的东北文学的独特存在
138	第三章	繁荣与发展的东北解放区文学
152	第四编	十七年东北文学时代的交响与变奏
154	第一章	向着“太阳”歌唱
163	第二章	现实主义旗帜的召唤
179	第三章	民间文学——游走在边缘与主流话语之间

185	第四章	红色叙事的狂欢
199	第五编	“文革”时期东北文学的沉吟
201	第一章	“文革”时期东北文学的凋敝与荒芜
227	第二章	“文革”后期东北文学的异化与抗争
246	第三章	“文革”结束后东北文学的过渡与复兴
250	第六编	东北 80 年代文学：时代大潮与地域文化底蕴的碰撞与交响
252	第一章	时代大潮冲击下的伤痕、反思、改革文学
268	第二章	东北知青文学对知青题材不同角度的诠释与挖掘
281	第三章	东北寻根文学：时代“寻根”思潮与东北地域文化底蕴的共鸣
296	第四章	带有“黑土地”气息的东北“个性化”“先锋态”文学
308	第七编	东北 90 年代文学：走向边缘后的多元发展
309	第一章	东北文学文化传统的嬗变
321	第二章	现代的陷阱
325	第三章	商业化的文学与克隆
328	第四章	传记文学的崛起
336	第五章	人性的复苏与理性的困惑
345	后记	

第一编 古代向近代过渡时期 东北文学的渐进历程

从“康乾盛世”结束至鸦片战争爆发之间的历史阶段，是中国历史从古代至近代的过渡时代。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演绎着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走向衰朽的重要过程，也突显着近代以后中国社会发生重大转变的多方面的历史内因。在这个相对沉寂的时代，东北文学悄然发生着变化，其变化趋势是在对原有文学结构的有限解构中，整体上走入颓势。

从总体上看，古代东北作为一个与中原具有千丝万缕关系的特殊区域，其文化与中原文化有着长期的交流与交融史。从北魏、隋唐、辽金直到清代，虽然在旧有的中国大文学史当中，东北作家，特别是东北的少数民族作家占据了一席之地，如萧观音、纳兰性德、曹雪芹等，但是直到人类社会的历史进入到 19 世纪，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整体状态上衡量，与中原地区相比，东北地域仍然滞后很多。与之相关，汉语言文学的发展也相对落后。19 世纪中期以前，除了流人作家，现在的黑龙江地区基本上没有本土文人，吉林地区的第一位本土作家是成名于 19 世纪中期的沈承瑞（1783 ~ 1840）。东北区域内的作家及其文学活动主要集中在今天的辽宁地区。继清初的宗室作家高塞、“乌拉部长”的后人马长海、被称为“辽东三老”的陈景元、李铠、戴亨等作家之后，在 19 世纪中期的

辽东地区又形成了一个以缪公恩（1756～1841）为首的作家集团。19 世纪晚期，在接近辽宁的漠南蒙古地区还出现了著名的蒙古族小说家尹湛纳希（1832～1892）。相对而言，集中于北京地区的东北籍作家的创作成就更为引人注目，他们有机会更为直接地接受汉文化的洗礼，与最优秀的汉族文人直接交往，文学成就和个人的名气更大，产生了奕绘（1799～1838）、顾春（1799～1877）等宗室作家，铁宝、英和等政治家兼作家。与康乾时代的东北作家在全国的名望相比，这一时期东北作家的地位有所下降，几乎只有顾春一人被纳入过中国大文学史研究者的视野中，高鹗、裕瑞、昭槁等人在个体文学或历史文化研究中有相应的学术地位，其他仅为民族文学或地域文化研究者所关注。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随着东北原生民族汉化的加深，本民族的文化精神越来越少地进入到文人文学创作领域，使以中原文学为榜样的跟随性的文学活动没有持续发展的后续动力，更缺少内在的创新能力。到了中西文化交汇激荡的时代，东北文学仍然固守中原文学的历史传统，没有及时汲取新的文化精神作为文学发展的精神动力，因而极度缺乏先进性和创新性。

东北文学在古代的发展形态一般都呈现出独特的区域特色，即文人文学与民间文学基本上是沿着两个不同的轨道相对独立地存在，相互平行地发展，绝少相交之处；文人文学基本上都是用汉文写成，现存极少的少数民族语言的文人作品，明显地仿照了中原的汉语文学作品；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以口头文学为主，并主要地在民间流传，与文人文学分属不同的系统，互相间的影响和联系不明显。到了 19 世纪，东北文学的主流仍然维持着这样的发展趋势，但在满族文学中显现出了二者在一定程度上的结合。东北文学发展的历史特点决定了东北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中虽然存在着诸多在文学、文化、民族、宗教、历史等多重意义上具有重要价值的作品，但长期以来受我国主流文学观念及传统文学史观的影响，长期地被冷淡和漠视，很少能够纳入研究者的视野。这样对东北的古代文学的研究基本上就成为对东北古代文人文学的研究，而东北古代的文人文学又主要是在中原文学引导下发展，这就构成了古代东北区域的文化土壤与文人的文

学创作相对分离这一种相当特殊的现象。所以在诸多学者的视野中，古代东北文学的历史变迁也只能是随着中原文学的发展变化而变迁的。受东北文学的研究习惯所限，又考虑到本书各章的和谐，本编主要以 19 世纪前半期东北文人文学为主要考察对象，勾勒其变迁的基本历史面貌与过程，追寻其种种内因与动力。在这一阶段，东北文学自身的客观发展状况原本没有明显的界限，只是为了论述的方便大致划分为嘉庆时期（1800 ~ 1820）、道光前期（1821 ~ 1840）两大阶段，另外，基于东北本土文学较中原文学的滞后性发展及其后文学作品与前期作品的某种特殊的相关性，本编还简要论及道光以后一部分古代东北文学的流变状况。

第一章 稳中蕴变的嘉庆时代

一、19 世纪初东北文学的资源状况

19 世纪的东北文学上承 18 世纪中后期的文学传统，又有一些新的变化。与清初函可等流人作家、纳兰性德等满族作家以诗词创作为主的态势有所不同，乾隆时代的东北文学小说、戏剧、诗词各种文体全面繁荣，首先是出自正白旗包衣世家的曹雪芹笔下的《红楼梦》，作为清代文学扛鼎之作，在历经近半个世纪的前 80 回《石头记》体系的抄本流传之后，1792 年、1793 年分别印刷出版了 120 回的“程甲本”和“程乙本”两个版本，特别是“程乙本”在社会上流传更广，使《红楼梦》从一度以黄金来交易的权贵手头的“爱物”，走向普通的士子、市民阶层，几乎影响到了 19 世纪东北文学各个时期的作家和多种体裁的文学创作。受蒲松龄《聊斋志异》的推动，18 世纪文言笔记小说潮中也曾涌现出长白浩歌子的《萤窗异草》、和邦额的《夜谭随录》等优秀作品。与前二者同为旗人出身的唐英的戏剧艺术更以通俗诙谐的平民化格调在清代戏剧舞台上独树一帜。东北本土作家王尔烈流传下来的作品不多，但其才智和幽默，几乎成为东北文人的形象大使，相对而言也更多地负载了东北民间文化的精神气质。

乾隆时代的东北作家与康熙时代的东北作家相比，在走出了东北的高山、林莽、雪原之后，受中原等地汉文化的直接熏陶，汉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在身体里的东北本土文化血液与满眼的汉族文化的交接激荡中，在中国多地域文化、多民族文化，特别是南北方文化、满汉文化的综合体验

中，生成了极大的创作热情和创新动力，取得了空前的创作成就。在这些成就的背后，有稳定繁荣的历史基础，家世人生的生活体悟，文化文学的交融积累，更主要的原因是东北作家对汉文化的积极吸纳和全新把握的结果。进入 19 世纪，历史时序和社会环境发生了重大变迁，随着封建制度的进一步没落，国内外形势的渐变，促使整个中国的历史背景、学术文化、文学思潮都发生了改变，统治中国的满族也从一个生机勃勃的民族步入衰落的历程，文人心理趋向忧郁、焦虑，整个汉文文学由繁荣走向沉寂，东北文学持续繁盛的基础随之发生变化，文学面貌自然而然地发生了缓慢的变迁。

二、嘉庆时代文学环境的变化

中国古代的文学与今日的文学相比，不仅在作者队伍、文学传统等文学的内环境方面有一定的差别，而且在文学的社会功用等文学的外环境上也有一定的差异。尤其是传统的汉文文学超成熟发展的明清时代，作者基本上不出官宦和士子阶层，文学创作无论唐宋之争还是先秦两汉之别，都难以超出固有的文学传统束缚；将文学看成百代之盛事、“立言”之大业、“传道”之宏途的观念，也使文学更多地与整个社会的政治及学术研究密切相关，因此，那个时代的文学是绝对“纯”不起来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变动，都可能与文学相关或者连动着文学的变迁。

历史环境的变化

世纪末情节在 200 余年前的中国就出现过。1795 年，统治中国 60 年的乾隆皇帝逊位于皇十五子颙琰，自己做了太上皇，中国历史进入到嘉庆年间。晚年的乾隆早已不复先前的英武干练。嘉庆三年（公元 1798 年），乾隆皇帝 87 岁，朝鲜使臣在给本国政府的报告中描述说：“太上皇容貌气力不甚衰老，而善忘比剧。昨日之事，今日则忘，早间所行，晚或不

省。”^① 乾隆昏老，嘉庆碍于父皇尚在，而且即位时乾隆明确要求他“以朕之心为心，以朕之政为政”，只能“太上皇笑他亦笑，太上皇喜他亦喜”^②，徒有皇帝的空名，无法实施皇帝的专权。这个政治空间让有清以来最大的贪官和珅得以出头。和珅哪来的那么多钱？就是因为他一定程度上掌握了官员的任用权，才能聚敛富可敌国的财富。处于封建末世、且由人数所占比例极小的民族统治人口众多民族的清朝能够维系 200 余年，又创造过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辉煌盛世，诸多原因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建立了强有力的皇权专制制度。吸取明朝的教训，清代封王不裂土，又逐渐解决了亲王干政问题，将爵位与官位脱钩，将清代的国是决策权及县以上官员的任用权全部收归皇帝一人。因此和珅对清王朝的祸害决不是大家能够直接看到的贪污了巨额钱财，更在于他身为臣子却窃取了一定的皇权，打乱了被认为公正合理的政治秩序，加重了官场的不公正现象和腐败风气，加速并加重了创造出康乾盛世的行政机制在 18 世纪末叶的运行不畅。

乾隆时代末期，清王朝的最后一个盛世实际上已成昔日黄花，在国家的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漕运、盐务、河工先后出现问题，川陕等地的白莲教等起义频繁，一时难以平息，正统的社会公正观念受到挑战，官场的腐败之风盛行，国家的行政机制无法及时解决新的社会问题。1799 年，乾隆去世，嘉庆皇帝正式接管国家的最高权力。他虽然胸怀大志，但无力回天。雷厉风行地铲除了和珅显示了他的果决和干才，但面对各地此起彼伏的白莲教起义和父亲留下的多年的官僚班底，为了稳定局面，他不得不公开表示对和珅的余党不予追究，因为他深知当时的他已不再像自己的父亲一样拥有令行即止的皇帝的权威，离开了层层官僚的支撑，他只是个空头皇帝。1813 年，又爆发了天理教起义，林清率领起义军进攻紫禁城，再一次给嘉庆皇帝及整个统治集团造成极大的震动。自此，康熙平定三王之乱后清代延续了 100 余年的太平盛世，成为了无可挽回的历史陈迹。

①②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 12 册，第 4953 页，第 4912 页。

另一种威胁也悄然而至。自嘉庆初年，西方列强就开始向中国偷运鸦片，嘉庆七年，英国派6艘军舰游弋于广州附近的洋面上。清朝面临了从未遇到过的新问题：需在国内禁毒并应付来自海上的经济渗透和军事威胁。

学术环境的变化

思考国家问题的不仅仅是一个皇帝，此前的乾隆时代，以1773年开设“四库全书”馆为标志，中国学术进入大总结时代。虽然经过雍正乾隆时代的思想专制，明末清初“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民主思想受到压抑，兴起了考古习古的学术风气。但在强大的复古主义风潮中，却潜藏着戴震、章学诚、汪中、焦循、洪亮吉等一代有识之士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严肃思考。我很同意杜书瀛先生主编，钱竞、王飏二位先生所著《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第一部中的观点：“乾嘉之学，在今天看来，很难以为是在‘避席畏闻文字狱’的恐惧心理下对政治的逃避，也不应该将乾嘉之学的主导人物仅仅视为一批只懂得训诂、考据的狭隘的文献技术专家。事实上，无论当时学者意识到与否，他们都是在做一件大事，是在致力于一次含有深远目的之学术统绪调整，也是一次对宋元明以来七百年国家兴亡历史的总结。当然，在乾嘉时期的社会政治文化框架之内，他们落实下来的工作策略，就是在恢复汉学的名下倡导实事求是的实证学风，借此清算已长时间受到佛道教义等异端沾染的宋明理学，而目的则是在复古的追求中，试图恢复和重建理想社会。如果用这样的眼光来看乾嘉之学，甚至将它视为中国在18世纪的文化复兴运动，一次通过大规模经典文献的整理以还原儒家原初宗旨的学术运动。”正如钱竞先生分析的那样：“不能不看到，乾嘉考据学者对原儒宗旨的追求往往被淹埋在浩繁的爬梳整理工作之中，甚而至于将作为工具理性存在的训诂、考据之学置为价值理性的前提，几乎有超越义理而独占中心之势。”但正是有了这一代学人的梳理考证、深思苦求，才孕育出后来的今文学派的思想，进一步催生龚自珍、魏源那样的启蒙思想家。

文学环境的变化

与乾隆时代的整个政治氛围相一致，“明清易代的历史震荡已经完全

过去了”，“民族对立的意识也更加淡化”^① 文学领域正统、载道、温厚的主张占主流。比如几乎影响了整个清代的桐城派古文，自方苞开始强调“义法”，追求与八股时文相异的内容、形式相统一的新文体，经过刘大櫆、姚鼐的传承发扬，渐渐形成了保守刻板的桐城“道统”。诗歌领域占主导地位的理论主张是沈德潜的“格调说”，要求文学作品合乎“温柔敦厚”的“诗教”，风格上要中正平和、委婉含蓄。在提倡诗风的“醇正”方面，稍后的翁方纲与沈德潜的主张有一致性，但他标举“肌理说”，认为学问是作诗的根本。对于这些危害到文学的情、趣、形象等艺术性和抒情性的理论主张，不断有人奋起反对。比如清中叶兴起的骈文和新的散文流派“阳羨派”，针对桐城派的严肃和保守加以批判。诗歌方面，袁枚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性灵说”，认为诗歌的本质是“由情生也”，“性情以外本无诗”，性情又是个人的、个性化的，对于具体创作，不是要效仿哪位古人，而是强调个人的才华。词学领域，清初三大家的词只有朱彝尊的浙派词得以延续，厉鹗大抵承续朱彝尊，推举清婉深秀的词风。但同一种风格持续太久，难免失去活力。到嘉庆年间，词学再兴，由张惠言开创的“常州词派”影响日盛。他们主要主张词要讲比兴，要有寄托，要抒发内心蕴藉的幽怨之情。周济对张惠言的观点进行了发挥和修正，影响更为广泛，笼罩了此后的清代词坛。

各种思潮频生，标志着包括学术、文学在内的整个中国社会正酝酿着变革。实际上自晚明开始，中国的知识精英就已经意识到传统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出现了危机，但他们是在传统文化的范畴之内上下求索，处于梦醒了无路可走的尴尬境地。康乾盛世暂时缓解了社会危机，到了乾隆后期和嘉庆时代，各种危机无法掩饰地逐渐暴露，而中国知识分子仍然不知道中国之外的世界早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早在曹雪芹“泪尽而逝”的时候，英国就开始了产业革命，黑格尔创立了客观唯心论体系，欧文、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也在乾嘉时代确立；乾隆朝由盛转衰的关键时刻，

^①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下 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91页。

北美大陆上诞生了朝气蓬勃的美利坚合众国，同年，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出版，西方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得以确立；1782年，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西方国家出现了第一次技术革命，1789年，法国议会通过了《人权与公民权宣言》，成为议会民主制国家的经典性文献。在一个封闭的文化体系内，不能清醒地认识自己，何谈正确地改造社会？那个时代精英们的忧患因而既令人敬佩，又令人悲悯。

嘉庆初期的学术与文学，基本是乾隆时代的延续，所以与“康乾”这一历史时段的称谓相仿，“乾嘉”成为学术文化的一个阶段性称谓。嘉庆以后的文学创作，与康乾时代相比，总体上在走颓势，许多文学家本身也是思想家、学术家，文学创作中往往反映出他们对于传统文化的看法，对他们所处的历史时代人生和社会的感受和思考，理论探讨虽然活跃，各种流派也此起彼伏，但没有产生《桃花扇》、《长生殿》、《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那样的经典作品。而且以今天的眼光审视，在司汤达著《红与黑》、拜伦作《唐璜》、巴尔扎克创作《人间喜剧》的时代，大多数中国文人还在治经、作诗、填词、写骈文，在为宗唐宗宋或崇尚先秦之学、两汉之学争执不休，未免带有太多的悲剧色彩。

三、地域文学的自觉

满族文化典籍的集中产生

自古社会酝酿变革的前奏都是对历史的总结，乾嘉时代正是一个大总结的时代。在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全面总结的同时，也是作为统治民族的满族对自己的历史和文化进行大总结的时期。乾隆四年（1739），较为全面记载满族社会历史、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的综合性历史著作《八旗通志》成书，嘉庆元年（1796）增修《八旗通志二集》，乾隆五十七年（1792）又修撰了《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辑要》。乾隆九年（1744），《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刻印，相当详细地记录了除爱新觉罗家族以外的满洲氏族的源流世系。乾隆十二年（1747）年，《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定稿，乾

隆三十六年（1771），《满洲家祠祭祀仪注》成书，嘉庆元年（1796）刊刻，规范了满族的各种祭祀礼仪。乾隆四十三年（1778），《满洲源流考》完成，考证了肃慎至满洲部族的源流、满洲发展史上的都城及路府州县的地界、东北境内的名山大川、历代沿革等内容。嘉庆九年（1804），辑录旗人诗词的《熙朝雅颂集》刊刻，收录了 600 余位旗人作家的作品。这些著作基本上都是在皇帝的直接支持下编撰出版的，具有严肃性、正统性和权威性，成为《满文老档》后专门研究和记录满族及八旗历史文化的新典籍。

区域文学自觉时代到来

随着满族民族文化自觉时代的到来，东北文学也进入到地域文化的自觉时代。

首先，继乾隆时代以北京满族贵族为主体的满族作家群^①形成之后，一些北京的落魄文人开始回归东北、走向民间，东北地区出现了以盛京（今沈阳）为活动中心的文人集团，写作由满族演唱文学发展来的子弟书本子，东北区域内文学的地域文化色彩较以前有增强的趋势，为其后东北文学艺术特别是民间文艺在近现代的繁荣发展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其次，面对国内文学领域内此起彼伏的各“说”各“派”，东北作家也表达了自己的见解，比如乾嘉之际有名的蒙古族学者和诗人法式善（1753～1813）提出：“有学人之诗，有才人之诗，学人之诗精通训诂考据，而性情或不传；才人之诗神悟天解，清微超旷，不可羁绁。唐之太白、乐天，宋之放翁、诚斋，各得其所近。”铁保（又作铁宝）（1752～1824）认为文学创作“不必以章句盗袭古人，亦不必以法度绳夫古人”。他们与纳兰性德“子无问唐也、宋也，问子之诗安在耳”、曹雪芹“令世人换新眼目，不比那些胡牵乱扯，忽离忽遇，满纸才子淑女、子建文君红娘小玉等通共熟套之旧稿”的主张是一脉相通的，都不同意在古人古书那里找依据，力主独创。他们与同时代的汉族文人学者一样，感受到了文

^① 详见张菊玲等《清代满族作家诗词选》，时代文艺出版社 1987 年版，前言。

学需要变化，但在如何变化上有自己的见解。汉族文人总是从学统、道统的不同，借复古来变今，而东北文人则从人的天性出发，以自然人情来反传统。这使东北文人的理论主张与明清时期以李挚、袁枚等为代表的反传统、反理学、反理性的思潮达成了精神上的一致。由于居于文坛主导地位的一直是汉族文人，东北学者文人的声音不可能对整个中国的文坛有多大的影响，但他们的声音的整体性存在，形成了清代东北文学理论独立而一贯的特色。

四、嘉庆时代东北文学概貌

作家队伍的构成

嘉庆时代只有短暂的 20 余年，与漫长的康乾时代相比，作家当然少得多。这一时期的东北文学作家与之前没有大的区别，主要由三部分人构成：宗室作家、文人作家、流人作家。^①

宗室作家主要有佟佳氏（1737～1809）、颀琰（1760～1820）、昭桂（1776～1829）、文篁（1786～1817）、永理（1792～1823）。与乾隆时代的宗室作家相比，他们的思想锋芒明显消融，民族特色也在减弱，文学创作的水平相对不高，主要是宗室的优越地位和纯熟的汉文化修养成就了他们的文学名声。

文人作家以王尔烈（？～1801）、法式善（1753～1813）、高鹗（1783～1815）、伯麟（？～1824）、桂芳（1773～1809）、铁保（1752～1824）、莹川（1754～1814？）为代表，其中高鹗的成就最大，但王尔烈的名声更响，因为在他的身上体现出更多的是盛世气象和东北民间文化当中幽默乐观的生命意识。

流人作家的数量很少，主要是流戍黑龙江的刘凤浩（1807～1814 年流戍黑龙江）和西清（嘉庆年间流放黑龙江），他们在文学的贡献上与前

^① 参见李春燕主编《东北文学史论》第四编《清代东北籍文人文学概观》，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8 年版。